



一力
文库

039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中国人的精神

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

——李大钊

An invaluable but hitherto unsuspected asset of
civilization here in China.

辜鸿铭 著 李晨曦 译

Western Eye for the Chinese People



上海三联书店

C955.2
G439.2

一力文库 039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中国人的精神

辜鸿铭 著 李晨曦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的精神：汉英对照 / 辜鸿铭著；李晨曦译. —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1

ISBN 978-7-5426-3131-2

I. 中... II. ①辜... ②李... III. 民族性—研究—中国—汉、英
IV. C9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5717号

中国人的精神

著 者/ 辜鸿铭

译 者/ 李晨曦

责任编辑/ 戴 俊 叶 庆

特约编辑/ 刘 洋

装帧设计/  灵动视线

监 制/ 研 发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396弄10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640×965 1/16

字 数/ 110千字

印 张/ 8

ISBN 978-7-5426-3131-2/G · 1000

定 价：16.00元

绪 论

良民的信仰

我们不是正在做正确的事吗？

那些乌合之众，我们必须愚弄他们！

看吧，现在他们多么无能！看吧，现在他们多么野蛮！

因为这就是乌合之众。

当你愚弄他们时，所有这些亚当的子孙都是无能和野蛮的；

只有正直和忠诚，才能使他们全部回复人性。

——歌德

此刻之大战世界瞩目，超过其他事情。但我以为，这场战争本身必须促使那些认真思考之人把注意力转向文明这个大问题。所有的文明皆始于对自然的征服，即征服和控制自然界中令人恐惧的物质力量，使其不再危害人类。当今的现代欧洲文明已成功地征服了自然，而且必须承认，迄今尚无其他任何文明能够如此成功。然而在上，有一种力量比自然界的物质力量更可怕，那就是人心中的激情。自然的物质力量给人类造成的伤害，远不及人类的激情所带来的伤害。因此，很显然，在人类的激情这种可

怕的力量能够完全被控制之前，不仅是文明，甚至连人类的生命都不可能存在。

在早期的原始社会，人类不得不用自然的物质力量来征服和克制人类的激情，这使得原始的游牧部落受制于纯粹的物质力量。但是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发现了一种更有效的控制人类激情的力量，这就是道德的力量。过去在欧洲，有效地控制人类激情的道德力量是基督教。但是现在，此前提到的这场军备战争似乎表明了基督教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已经失效。由于没有有效的道德力量来控制 and 抑制人类的激情，欧洲人再次利用了物质力量来维持公民的秩序。确如卡莱尔^①所言：“欧洲是无政府状态，外加一个警官。”利用物质力量维持公民秩序导致了军国主义。实际上，如今的欧洲之所以依赖军国主义，是缘于没有有效的道德力量。但是军国主义导致了战争，而战争则意味着破坏和浪费。因此，欧洲人进退两难。如果他们远离军国主义，无政府状态将毁坏他们的文明，但是如果他们继续奉行军国主义，他们的文明也会因为战争的浪费和破坏而瓦解。然而英国人说，他们决心制止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基希勒勋爵^②相信他能以三百万训练有素、全副武装的英国士兵来消灭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但在我看来，当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因此而被消灭时，似乎会有另一个军国主义——英国军国主义——出现，而它也不得不重蹈覆辙。这似乎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而无计可施。

但是确实无计可施吗？不，我相信是有办法的。很久以前，

① 卡莱尔 (Thomas Carlyle, 1795—1881)，生于苏格兰，英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社会批评家，曾任爱丁堡大学校长。他的著作如《法国革命》(1837年)，以对社会和政治的犀利批评和复杂的文风为特色。——译者注

② 基希勒勋爵 (Lord Kitchener, 1850—1916)，英国陆军元帅、外交官、政治家。

美国的爱默生^①说过：“我能够轻而易举地预见到对步枪的崇拜如此野蛮，必然破产——尽管伟人们也崇拜步枪；而且正如相信上帝的存在一样，我们确信，武力会招致另一种武力，只有爱和正义的法则才能实现彻底的革命。”如今，若欧洲人真想扑灭军国主义，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利用爱默生称之为不以暴易暴的正义和爱的法则——实际上就是道德的力量。随着有效的道德力量的建立，军国主义就会因为没有用武之地而自行消失。但是现在，既然作为道德力量的基督教已失效，欧洲人面临的问题则是：从何处找到这种新的消灭军国主义的有效的道德力量？

我相信，欧洲人将在中国——在中华文明中——找到这种新的道德力量。在中华文明中，这种能令军国主义成为多余之物的道德力量就是良民的信仰。然而，人们会对我说：“中国也有战争。”这是事实，中国也有战争；但是自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时代起，我们中国人从未有过今天在欧洲所见的军国主义。在中国，战争是意外，而在欧洲，战争已成为需要。我们中国人很有可能发生战争，但我们不会生活在对战争的不断期望之中。其实，在我看来，在欧洲大陆令人无法忍受的事其实并非战争本身，而是每个人都经常担心，他的邻居一旦有足够强大的能力时，会来抢劫并谋杀他，因此他不得不武装自己，或者雇一个武装警察来保护他。所以，困扰欧洲人的问题并非是战争的爆发，而是不断武装他们自身的必要性，即运用物质力量来保护他们自身的绝对必要性。

如今在中国，由于我们中国人有良民的信仰，一个人不会觉得有必要利用物质力量来保护自己；他甚至很少需要寻找和借助

① 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19世纪美国伟大的思想家、散文家和诗人，超验主义哲学主要倡导者。他的诗歌、演说，特别是论文，例如《自然》（1836年），被认为是美国思想与文学表达发展的里程碑。——译者注

国家警察的外力来保护自己。在中国，一个人因为他邻居的正义感而得到保护；他因为他的同伴愿意服从的道德责任感而得到保护。实际上在中国，人们觉得无需物质力量来自我保护，因为他确信每个人都认同：正义和公平作为一种力量比物质力量更重要，道德责任必须被服从。现在，你若能使所有的人也承认和赞同上述观点，那么物质力量将一无用处；而世界上将不再有军国主义存在。但是，在每一个国家当然都会有一小撮人，一些罪犯，世上还有些暴徒，他们不愿意或者不能认同正义和公平是高于物质力量的一种力量，以及道德责任是某种必须服从的东西。因此，为了防备罪犯和暴徒，不管是在一个国家还是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总需要保留一定数量的物质力量或警力以及军国主义。

然而，人们会对我说，你如何使人类认同正义和公平比物质力量更重要呢？我的回答是，首先使人类确信正义和公平的有效性，使其确信公平和正义是一种力量；实际上就是使他们信服仁慈的力量。但是，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是这样——为了做到这一点，中国的良民信仰在每一个孩子识字之初就教导他们：人之初，性本善。^①

在我看来，今天欧洲文明的主要病因在于它错误的人性观念——它认为人性是邪恶的。由于这一错误观念，欧洲的整个社会结构总是取决于武力。欧洲人赖以维持文明秩序的两个武器是宗教和法律。换言之，欧洲人是以对上帝的敬畏和对法律的恐惧来维持秩序的。恐惧意味着武力的使用。因此，为了延续人们对上帝的敬畏，欧洲人最初花巨资供养了大量无用的所谓牧师。别的暂且不提，这种做法的花费如此之高，以至于它最终成了人民无法承受的一种负担。实际上，在宗教改革三十年的战争中，欧洲人就试图摆脱牧师。在摆脱了那些通过敬畏上帝而使人民保持秩

^① 这是中国的每一个孩子在上学时，手中拿着的第一本书上的第一句话。——原注

序的牧师之后，欧洲人试图以对法律的恐惧来维持文明的秩序。但是要树立法律的权威，欧洲人不得不花费更多的钱来供养另一个依然无用的阶层，即所谓的警察和军人。现今，欧洲人逐渐发现供养警察和军人以维持秩序的费用，甚至比供养牧师更昂贵，更具毁灭性。所以实际上，就像在宗教改革三十年的战争中欧洲人想要摆脱牧师一样，在眼下的战争中，欧洲人真正想要的是摆脱军人。但是如果欧洲人想摆脱警察和军人，他们就要面临选择，或者召回牧师以保持对上帝的敬畏，或者找到能够像敬畏上帝和恐惧法律一样，帮助他们维持文明秩序的其他力量，两者择其一。把这个问题讲得更直接一些，我认为，每个人都会承认，这是欧洲文明战后面临的大问题。

如今，在欧洲人汲取了牧师的教训后，我认为他们不会想要恢复牧师阶层。俾斯麦^①曾说：“我们永远不会返回卡诺萨^②。”此外，现在即使召回牧师也是徒劳，因为欧洲人已丧失了对上帝的敬畏。因此，在欧洲人面前只剩下另一个选择，如果他们想要摆脱警察和军人，就要寻找某种能够帮助他们维持文明秩序的其他力量，像对上帝的敬畏和对法律的恐惧一样。我相信，如今这种力量，正如我前面所述，欧洲人会在中国文明中找到。这种力量我称之为良民的信仰。在中国，这种良民的信仰是一种不必借助牧师和警察或军人就能使国家的百姓有秩序的信仰。确实，在这种良民的信仰下，中国众多的百姓——也许人口不比整个欧洲大陆少——在没有牧师和警察或军人的管制下依然能保持实际的和平与秩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牧师、警察或军人在帮助维持公共秩序方面扮演了一个极其次要的、非常无关紧要的角色。在中国，只有最无知的阶层才需要牧师，只有

① 俾斯麦 (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德国政治家，德意志帝国第一任首相。——译者注

② 卡诺萨 (Canossa)，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城堡。——译者注

最坏的罪犯才需要警察或军人的威慑。所以我说，如果欧洲人真的想要摆脱宗教和军国主义的控制，摆脱带给他们如此多动乱和流血的牧师和军人，他们就得来中国找到我所说的良民的信仰。

简而言之，我想呼吁欧洲人和美国人注意的是，在其文明似乎受到崩溃威胁的这个时刻，在中国，这里有一种迄今不容置疑的无价的文明财富。这一文明财富并非这个国家的贸易、铁路、矿产、黄金、白银、钢铁或是煤炭。如今这笔世界的文明财富，我想在此指出，就是中国人——坚守良民信仰的尚未改变的真正的中国人。真正的中国人，依我说，是无价的文明财富，因为他是一个不需社会付出多少代价就能遵守秩序的人。确实，我在此想警告欧洲人和美国人，不要毁掉这笔无价的文明财富，不要去改变和损害真正的中国人，而他们现在正试图用他们的新知识影响中国人。如果欧洲人和美国人成功地毁灭了真正的中国人，毁灭了中国式的人性，成功地把真正的中国人转变成欧洲人或美国人，即一个需要牧师或军人使其保持秩序的人，那么确定无疑的是，他们会使世界的宗教或者军国主义的负担增加——而后者此刻已成为文明和人性的一個威胁。但是另一方面，假设有人能够通过某种方法或者其他方式改变欧洲人或美国人典型的人性，使其转变成不需要牧师或军人来保持秩序的真正的中国人——请想一想，这将给世界减轻多大的负担啊！

现在，综上所述，这场战争引发了欧洲文明的大问题。我以为，欧洲人首先想通过牧师的帮助来维持文明秩序。但没过多久，牧师导致了巨大的花费和太多的麻烦。然后欧洲人以三十年的战争驱逐了牧师，召来警察和军人来维持文明秩序。但是如今他们发现，警察和军人导致了更多的花费和麻烦，甚至超过了牧师。现在欧洲人该做什么呢？驱逐军人召回牧师吗？不，我相信欧洲人不想召回牧师。此外，牧师现在也没有用处了。但是欧洲

人会做什么呢？我看到剑桥的洛斯·狄金逊教授^①在《大西洋月刊》上题为《战争及其出路》的一篇文章，写道：“召来民众。”我担心一旦召来民众代替牧师和军人，会带来更大的麻烦。在欧洲的牧师和军人引发了战争，但民众会带来革命和无政府状态，到那时欧洲的状况会比此前更糟。现在我给欧洲人的建议是：不要召回牧师，为了仁慈的缘故也不要召来民众，但是可以召来中国人；召来真正的中国人，他具有良民的信仰，两千五百年来他具备了不依靠牧师和军人而和平生活的经验。

事实上，我真的相信，欧洲人战后会找到文明这一大问题的解决之道——就在中国这里。我在此重申，迄今不容置疑的无价的文明财富是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他拥有欧洲人在大战后需要的一种新文明的秘诀，这种新文明的秘诀就是所谓的良民的信仰。这一良民的信仰首要原则就是相信人性本善，相信仁慈的力量，相信美国人爱默生所言爱和正义的法则具有的力量和功效。但爱的法则是什么呢？良民的信仰教导说，爱的法则就是爱你的父母。而正义的法则是什么呢？良民的信仰教导说，正义的法则意为真诚、守信和忠诚，妇女必须无私地绝对地忠诚于她的丈夫，男子必须无私地绝对地忠诚于他的君主、国王或皇帝。最后我在此想说，实际上良民信仰的最高义务就是忠诚的义务，不仅在行为上，而且在精神上忠诚，或者正如丁尼生^②所言：

尊敬国王就像他们是他们的良心
而他们的良心就是他们的国王
破除异教束缚追随基督教世主

① 洛斯·狄金逊（Lowes Dickinson，1862—1932），英国历史学家。

② 艾尔弗雷德·丁尼生（1809—1892），英国诗人，其代表作品《悼念》（1850年）和《轻骑兵的责任》（1854年），反映了维多利亚时期的情感和美学思想。1850年他获得桂冠诗人的称号。——译者注

目 录

绪论.....	1
中国人的精神.....	1
中国的妇女	47
中国的语言	67
中国领域的约翰·史密斯	75
一个伟大的汉学家	82
中国学(一)	89
中国学(二)	96
附录	
乌合之众崇拜教或战争及其出路.....	102

中国人的精神

一篇在北京东方学会中宣读的论文

首先，请允许我向各位阐释一下今天下午我想讨论的内容。我们论文的主题，我称之为“中国人的精神”。在这里，我的意思并非仅仅论及中国人的性格或特征。中国人的特征此前经常被描述，但是我想你们会和我一样认为迄今为止的这些描述或对中国人特征的列举，都未能描绘出中国人的内在本质。此外，当我们说到中国人的性格或特征时，它是不可能被概括出来的。你们知道，中国北方人的性格不同于南方人的性格，就像德国人的性格不同于意大利人一样。

但我用中国人的精神，意在指明中国人生存的精神支柱，是一种在本质上与众不同的东西，无论在中国人的心灵、性情还是情操上，它使他区别于其他所有民族，尤其是区别于那些现代的欧洲人和美国人。也许对我们所讨论的主题最恰当的表述是中国式的人性，或者，用更清晰简短的话来说，就是真正的中国人。

那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我确信你们都会赞同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尤其是现在，当我们环顾今日之中国，我们似乎发现，中国式的人性——真正的中国人——即将消失，取代它的是一种新型的人性——进步的或现代的中国人。事实上，我建议，在真正的中国人、古老的中国式人性从世上完全消失之前，我们应该最后一次认真地审视他，看看我们能否从他身上找到某种在根本上与众不同的东西，使他如此区别于其他所有民

族，并有别于今日中国所见的方兴未艾的新型人性。

我以为，在古老的中国式人性中最先打动你们的一点是，真正的中国人从不野蛮、不残忍，也不凶恶。借用一个应用于动物的术语，我们可以说真正的中国人是被驯化了的动物。拿中国最底层的人来说，你会发现，与欧洲社会同样阶层的人相比，他少了一些兽性，少了一些野蛮的动物性，少了一些德国人所谓的动物野性^①，我相信你们也会赞同我。事实上，以我之见，如果用一个英文单词概括中国式人性给你的印象，那就是“gentle”，即“温顺”之意。我所说的“温顺”并不意味着天性软弱或者软弱顺从。已故的麦高文博士^②说：“中国人的温顺，不是伤心而柔弱的人的那种温顺。”其实，我所指的“温顺”是不猛烈、不苛刻、不粗野或暴虐，没有任何刺激你的东西。在真正的中国式人性中，可以说，有着从容、冷静、练达的特点，就像你评价一块经过优良锻造的金属。甚至于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在身体上或者道德上的不完整，即使无法挽回，也至少会被他温顺的品格所弥补。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粗糙的，但粗糙中没有粗劣。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丑陋的，但丑陋中没有丑恶。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庸俗的，但庸俗中没有侵略和喧哗。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愚蠢的，但愚蠢中没有荒谬。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狡猾的，但狡猾中没有狠毒。我实际上想说的是，真正的中国人即使在身体、心灵和性格上有缺点，也不会让你厌恶。你会发现，一个真正的旧式中国人很少令人厌恶，甚至最低等的阶层也是如此。

我说，中国式的人性给你的总体印象是他的温顺，温顺到无以言表的程度。在对真正的中国人身上这种无以言表的温顺品质进行分析时，你会发现它是两种品质结合的产物，即同情心和智慧。我前面把中国式的人性比喻为被驯化的动物。那么，被驯化

① 原文为 Rohheit。——译者注

② 麦高文博士 (D. J. McGowan)，生平不详。

的动物与野生动物存在如此的不同是因为什么呢？在被驯化的动物身上，我们可以意识到某种人类特有的东西。这种区别于动物的人类特有的东西是什么呢？这就是智慧。但是被驯化动物的智慧不是一种思想智慧。它不是经过推理得来的智慧。它也不像狐狸的聪明一样来自本能——狐狸狡猾的智力是知道哪里可以吃到小鸡。狐狸来自本能的智力是所有的动物——甚至包括野生动物在内——都拥有的。但被驯化的动物身上具有的这种可以称为人类智慧的东西，与狐狸的狡猾或动物的智力有很大的不同。被驯化动物的智慧不是来自推理，也不是源于本能，而是来自同情心，来自一种爱和依恋的感觉。一匹纯种的阿拉伯马能理解它的英国主人，不是因为它学过英语语法或是它有听懂英语的本能，而是因为它热爱它的主人。这就是我所说的人类的智慧，以区别于单纯的狡猾或者动物的智力。正是因为拥有这种人类的品质才使被驯化的动物和野生动物相区别。同样地，我认为，正是因为拥有同情心和真正的人类智慧，才使中国式的人性，真正的中国人具有无法言表的温顺。

我曾在某处读到过一位外国人的文章，他在中日两个国家都住过。他说，一个外国人在日本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讨厌日本人，而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喜欢中国人。我不知道他在这里对日本人的判断是不是真实，但是，我认为，你们所有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会赞同他对中国人的评价。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对中国人的喜爱——你可以称之为“欣赏”——就越会与日俱增。在中国人身上有种无法形容的东西，不管他们多么缺乏清洁的习惯和文雅的举止，不管他们的心灵和性格上有多少缺点，他们依然比其他任何民族更能赢得外国人的喜爱。这种无法形容的东西，我把它定义为“温顺”，在外国人的心目中，即便它没有挽回中国人身体和道德上的缺陷，至少也削弱和减轻了这些印象。就像我试图向你们展现的那样，这种温顺又是我称之为具有同情心的或真正的人类智慧的产物

——这种人类智慧既不是来自推理，也不是源于本能，而是出于同情心——出于同情的力量。那么，中国人具有这种同情的力量的秘密是什么呢？

在这里，我冒昧地给出一个解释——如果你愿意，可称之为一个假设——对于中国人缘何具有同情的力量的秘密，以下就是我的解释。中国人具有这种力量，这种强烈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者说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精神生活。中国人全部的生活是一种感情生活——它不是来自身体器官意义上的感觉，也不是你所说的来自神经系统意义上的激情，而是情感或者人性友爱意义上的感情，它来自我们本性的最深处——精神和灵魂。甚至，我在这里可以说，真正的中国人过着一种情感或者人性友爱的生活，一种灵魂的生活，以至于可能有时过分地忽视了他应该做的事，甚至忽视了生活在这个由身体和灵魂构成的世界上的人维持其感观灵敏性所必需的要求。这就真实地解释了中国人对肮脏的环境、物质上的不便和举止文雅的缺乏为什么如此漠不关心了。当然，这与本文的主题无关。

我说，中国人具有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过着一种精神生活——情感或者人性友爱的生活。在此让我首先给你们举两个例子，来证明我对过一种精神生活的解释。下面是我的第一个例子。你们中有人可能认识我在武昌的一个老朋友和同僚——他曾在北京做过外务部尚书——梁敦彦^①先生。梁先生告诉我，当他第一次接到汉口海关道台的任命时，使他渴望成为满清大员、努力得到顶戴花翎以及他荣幸地接受这个任命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在意顶戴花翎，也不是因为他自此以后会富贵——在武昌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很穷——而是因为他想取悦母亲，通过他的晋升

^① 梁敦彦（1857—1924），清朝大臣，字崧生，留美幼童，曾就读于美国耶鲁大学，回国历任汉阳海关道、天津海关道、外务部尚书、外务部大臣等职。

让远在广州的老母亲心情愉悦。这就是我说中国人过着一种精神生活——一种情感或者人性友爱的生活的意思。

我的另一个例子是这样的。我在海关的一个苏格兰朋友告诉我，他曾有一个中国仆人，是个彻头彻尾的流氓，他撒谎、敲诈，总是赌博，但是当我的朋友在一个偏远的港口患了伤寒症病倒了，身边没有外国朋友照顾他时，正是这个糟糕的流氓，他的中国仆人无微不至地照顾他，连他亲密的朋友和亲属都做不到。甚至，我认为在圣经里有句关于一个女人的叙述，不只对这个中国仆人，对一般的中国人也同样适用：“宽恕他们多一些，因为他们爱得更多。”在中国，外国人看到并理解了中国人习惯和性格中的许多缺点和瑕疵，但他的心仍然被他们所吸引，因为中国人有一种精神，或者，像我所说的那样，过着一种精神生活——过着一种情感和人性友爱的生活。

我认为，现在我们找到了一条揭开中国人具有同情心秘密的线索——正是同情的力量赋予真正的中国人以具有同情心的或真正的人性智慧，让他具有如此无法言表的温顺。下面，让我们对这一线索或者假设加以验证。让我们看看用中国人过着一种精神生活这条线索，是否能够既解释我前面举出的两个个案，又对我们在中国人的实际生活中看到的普遍特征加以说明。

首先，让我们拿中国语言来说。由于中国人过着一种精神生活，我认为，中国的语言也是一种精神语言。现在，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在中国的外国人中，孩子和未受教育的人学习汉语非常轻松，比成人和受过教育的人更加容易。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依我说，原因在于孩子和未受教育的人是用精神的语言来思考和说话的，而受过教育的人，特别是受过欧洲现代智力教育的人，是用头脑或智力的语言来思考和说话的。事实上，受过教育的外国人发现学习汉语如此困难的原因就是他们受教育过多，受智力的和科学的教育过多。形容天堂的那句话，我们也可以用来形容中国语言：“如果你不变成小孩，你就不可能学会。”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中国人生活中另外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中国人有极好的记忆力。秘密是什么？秘密在于：中国人记忆事情是用心而不是用脑。心灵具有同情的力量，能产生像胶水一样的作用，比坚硬而干巴巴的头脑或者智力能更好地保留事物。举个例子，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我们所有的人是孩子的时候，我们记忆、学习事情的能力比我们成年后强得多。这是因为像中国人一样，在孩提时代，我们是用心而不是用脑来记忆事情的。

接下来，让我们探讨中国人生活中的另一个公认的事实——他们的礼仪。人们经常说，中国人是特别注重礼仪的民族。那真正的礼仪的本质是什么呢？这就是对他人感受的体谅。中国人有礼貌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精神的生活，他们知道自己的感受，这使他们很容易对他人的感受表示体谅。中国人的彬彬有礼，尽管不像日本人的礼仪那样经过了精心的准备，却令人愉悦，因为它是——用法国人优美的语言来说——一种心灵的礼仪。^① 另一方面，日本人的礼仪虽然精致周全，却无法让人如此愉悦，而且我已经听一些外国人说讨厌它，因为它可以被称做是一种排演过的礼仪——像在戏剧中用心学会的礼仪一样。这与直接发自内心的自然而然的礼仪不同。事实上，日本的礼仪就像一朵没有芬芳的花，而真正有礼貌的中国人的礼仪有一种芳香——一种名贵油膏的香味^②——由心而发。

最后，让我们看看中国人的另外一个特征，亚瑟·史密斯^③唤起了人们对此的注意而声名大噪，这就是：缺少精确。那么中国人缺少精确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原因，我还要这样说，是因为

① 原文为 *la politesse du coeur*。——译者注

② 原文为 *instar unguenti fragrantis*。——译者注

③ 亚瑟·史密斯 (Arthur Smith, 1845—1932)，中文名为明恩溥，多年在中国农村从事布道、医药、慈善、教育等事业，著有《中国人的德行》、《中国的农村生活》等作品，影响极深远。